

現代國家觀與“一國兩制”成功實踐

楊允中*

I. 憲法文明與現代國家觀

“我們堅持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增強香港、澳門同胞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讓香港、澳門同胞同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¹ 本文謹着重對國家意識與愛國精神作些探討。

一、堅守憲法文明

在 20 年“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中，最為關鍵、最為重要的一條是尊重“一國”、尊重中央全面管治權、尊重憲法及憲法文明的權威性，因為國家是整體、特別行政區是局部；“一國”是源，“兩制”是流，兩者是辯證統一關係，更是上下級關係、領導與被領導關係。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經過前一階段集中而深入宣傳推介，維護憲法權威、憲法規範、憲法精神、憲法文明已經成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各界人士的普遍共識。維護憲法家族的權威地位，應對包括憲章、憲制、憲政的憲法家族有一個必要而理性的認知。

“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² 憲法的權威性不僅在於其規範的高強制性和高約束力，而且更在於其代表全民意志和利益的最大化和客觀務實、探索創新的科學精神。憲章即憲法的別稱，亦涵蓋憲制性法律。憲制即憲法制度的簡稱，它是憲法規範的制度化，是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礎與前導，包括憲法規範的系統化、科學化、時代化、完整化。憲政即依憲治國和依憲執政，亦即憲法原則的正確實施和憲法精神的正確貫徹，即“以憲法為核心的民主政治”³，西方有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憲政，中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

在中國，推動憲政已有一個世紀之久，但真正令全國人民受到憲政保障是新中國成立後這 70 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後這 40 年，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已達到逐步完善、逐步成熟的發展新階段。2014 年全國人大規定了國家憲法日(12 月 4 日)，規定各級官員就職要履行憲法宣誓，全國人大職能部門之一法律委員會改稱憲法與法律委員會，充分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已進入了漸趨成熟的新階段。在進入“一國兩制”正確理解與成功實踐新時代的特別行政區，尊重憲法權威、宣傳憲法文明，

* 澳門理工學院名譽顧問、教授

當然包括對憲法、憲章、憲制、憲政即完整的憲法家族的理解與認定。

二、現代國家觀

在推進“一國兩制”事業中，伴隨浩浩蕩蕩的愛國愛港、愛國愛澳主題價值觀認同，樹欲靜而風不止，一小股“獨”風時有展露，有人認為事屬正常，高國際化、高多元化必然伴生一些基於認知和利益糾葛出現的對抗，有人認為匪夷所思，和諧穩定的形勢以及普羅大眾切身利益勢必受到衝擊。一個新生政權建立 20 年後管治基礎仍欠穩固，這絕非正常現象，但這有助於增強社會免疫力，也符合辯證思維。認真做好對外部因素的防範固然重要，但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的道理十分清楚。在推進對長達 20 年“一國兩制”實踐規律進行回顧、總結中，應該看到由於“怕”字當頭，怕東怕西，就是不怕國家核心利益與特區整體利益受傷害，為甚麼平民百姓往往都能確認的一些事項，某些身居高位的人反而認知不足，所以普法教育的目標群體顯然需要實現居民全覆蓋，包括高端人士。

所謂現代國家觀，亦即正確的國家意識，它至少應涵蓋下述領域基本要求：(1)對憲法及其確認的國體政體，包括中共領導地位的認同；(2)對中央全面管治權的認同；(3)對國家領土主權、核心利益的認同；(4)對國旗、國徽、國歌等國家標誌的認同；(5)對國家傳統文化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認同；(6)對二元性中國國情的理解與認同。

維護國家安全事關包括特區居民在內的全國人民核心利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家維護社會秩序，鎮壓叛國和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制裁危害社會治安，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和其他犯罪活動，懲辦和改造犯罪分子。”(第 28 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不得有危害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行為。”(第 54 條)

維護國家安全，對於憲制上直屬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別行政區，是義不容辭的憲制責任，完成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無論對特區政府還是對特區居民都是不容拖延、不容商量、不容討價還價的一項政治使命和考驗。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澳門特區早在 2009 年 2 月已通過第 2/2009 號法律《維護國家安全法》，完成了這項莊嚴使命，令基本法 145 個有效條文的實施達到了全覆蓋。2018 年 9 月，澳門又通過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維護國家安全法》的依法履職載體。這是適應國內國際安全形勢採取的一項頗為及時而有效的舉措，受到中央政府的肯定，也滿足了廣大市民的維權要求，充分體現在維護國家安全問題上，澳門特別行政區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

三、新時空、新態勢、新思維

2017 年 10 月舉行的中共十九大，標誌着當代中國已進入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作為國家不可分割組成部分的特別行政區，站在實踐作為基本國策的“一國兩制”前沿陣地，當然要理解並堅守同全國人民所組成的命運共同體與利益共同體的強勢特徵，正確理解新時代的必要性、重要性，正確把握新時代特徵和使命，是特區人的一項文化自覺要求。

40 年改革開放全面加速了中國和平崛起進程：改變了國人命運，改寫了中國國情，也改寫了人

類文明發展史。愛國主義有了新的時代內涵。作為當代中國人，親眼見到國家蒸蒸日上、欣欣向榮的繁榮富強景象，怎能不發出由衷的感慨。“如果說 20 世紀是美歐等發達國家代表的西方文明主宰世界，那麼 21 世紀各國人民將見證中華文化為核心的東方文明對全球和平發展的引航。如果說全球最大的中華民族巨輪有望 21 世紀中葉駛達偉大復興的勝利彼岸，那麼全新設計的澳門號‘一國兩制’新船將會是編隊同期抵埗當之無愧的一員。”⁴

40 年改革開放催生了澳門歷史性大變革：前半程是回歸轉變期，後半程是“一國兩制”實踐期。近 20 年澳門成功實踐“一國兩制”是國家 40 年改革開放並導致第一個一百年和平崛起初步實現的重要標誌之一。新時代“一國兩制”事業攀上新起點、新台階，形勢要求建立並完善正確的國家觀、歷史觀、時代觀、辯證認知觀。這既是新時代“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的要求，也是進入發達階段居民綜合素質持續提升的必然。

II. 關於正確實踐“一國兩制”基本經驗的思考

一、總結好第一個 20 年發展規律

“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對澳門第一個 20 年“一國兩制”實踐大方向、大原則，必須肯定不動搖。這不僅是澳門特區自身的問題，而且也是涉深含全國人民願望、利益、要求的基本國策的大事，總結“一國兩制”實踐規律不宜忽略八個基本關注點：

1. 國家恢復行使主權，中央全面管治權落實到位

憲法、憲制、憲政受到高水準尊崇與實施。這是一項涉及國家領土主權完整，洗刷多年民族恥辱的原則性大是大非，中央全面管治權到位，不僅意味着中央管治權威得到應有的尊重，而且也要求在新興政權下，不允許有妄圖挑戰國體、政體的現象存在。

2. 特區新興政權行使高度自治權有效不越位，民本不官僚

享有並行使高度自治權的特區公權力機關的民本性、愛國性、開創性，一時一刻也不容淡化。

3. 社會和諧、包容、穩定等文明指標常態化、有感化

“一國兩制”新制度、新政權最大優越性是求同存異、海納百川、化異為同、互利共贏，包括實現兩大基本社會制度——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認知與實踐兩大維度的對立統一。

4. 經濟持續走強，民生持續走高

經濟是基礎，民生是驗證社會制度優越性的高靈敏度指標。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既是時代命題，又是特區居民願望與利益攸關的大事。

5. 治港港人、治澳澳人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核心價值觀形成主流

作為文明發達社會制度建設創新標誌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即管治好、發展好、建設好香港、澳門，不僅有能力、有辦法，而且有智慧。

6. 特區正面、積極形象被國人、世人普遍接受認可

作為全新先進發展理念的體現，“一國兩制”的創新性、科學性、可行性，不僅要得到全國人民的理解與認同，而且還要在國際範圍內廣受讚揚與嫉羨。

7. 新時代新征程上，新思維新作為成為自覺追求與常態要求

進入全新歷史發展階段，爭取更高水準“一國兩制”實踐成效，關鍵在於特區政府和廣大居民通過建立相關新思維新作為，令創新常態化、發展均衡化。

8. 年輕一代接班人培育受到重視並具可比性成效

確保“一國兩制”事業薪火相傳、後繼有人，全力培育並大膽啟用年輕一代優秀人才，是一項時代課題，同時也不容放鬆非年輕人綜合素質的持續提升。⁵

二、澳門特區“一國兩制”實踐成效評估

(一) 澳門“一國兩制”實踐成功的主要方面

認定“一國兩制”第一階段長逾兩個十年依法施政期的實踐成功，澳門當仁不讓：政治上，澳門走出一條正確理解、正確實踐“一國兩制”的成功軌跡，澳門本身就是一個“一國兩制”現實陳列館；經濟上，澳門是全球最佳發展指標的創造者之一，受到重要國際組織肯定，在全國300多個地級以上大中城市中遙遙領先；文化上，澳門是愛國愛澳新型核心價值觀載體及新理念、新思維孵化器；社會上，澳門是寬鬆、和諧、包容、自強的有效指向器。當然，澳門尚存諸多有待完善的短板和不足，但這是前進中的不足、成長中的不足。

(二) 堅持“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必要性日漸凸顯

“一國兩制”事業是中外政治發展史上，乃至人類文明史上不存在先例的罕見創新，澳門單獨建立特區是充滿着政治智慧的高前瞻性決策；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有各自的成功經驗和各自面對的問題，香港在國際化、多元化以及行政效率等方面均值得認真學習；要立足國家現實繼續探索、拓展“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之路；澳門雖小，但其經驗、價值彌足珍貴；面對“一國兩制”實踐進入深水區新形勢，澳門的地位、作用、意義、影響無可取代。

(三) 確保正確實踐的關鍵環節不脫軌

一是堅持“一國兩制”、基本法求同存異、互利共贏初衷，“兩制”在“一國”之內共存，國家與特區共贏，中國與世界共享；二是堅持“一國兩制”層次性、公權力機關的行政主導性、政制發展與民生福祉兼顧性；三是堅持對國家意識和愛國愛澳一致性教育，對特區居民，尤其是青少年一代中的“回歸思維滯後綜合症”不容掉以輕心；四是堅持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正確理解，認真研究“一國兩制”實踐基本規律。

三、幾項相關認知的深化

(一) “一國兩制”歷史淵源再議

“一國兩制”毫無疑問是以總設計師鄧小平為首國家第二代領導集體在改革開放之初即明確推

出的一項基本國策，並以特別行政區制度成功實踐而載入當代中國發展史。但人們不應忘記，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也是新中國建國後推動國家和平統一以貫之的“一綱四目”思維的繼承與發揚廣大。

1963年初，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構想將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原則和主張概括為“一綱四目”：“一綱”即台灣必須統一於中國。“四目”為：(1)台灣統一於中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台灣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委於蔣介石；(2)台灣所有的軍隊及經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政府撥付；(3)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暫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蔣的意見，協商決定後進行；(4)雙方互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舉。⁶

歷史表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求同存異、對立統一、相信群眾、相信大多數，是中共一以貫之、堅持不懈的指導原則與思想作風，是它所領導的革命與建設取得成功的基本經驗。針對中國特殊國情，在實現國家最終完全統一征途上尚存歷史遺留的台灣、香港、澳門問題有待突破，上述“一綱四目”強調“一個中國”原則的不可動搖性，這是推動兩岸和平統一包括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的出發點、落腳點；同時強調保留原有社會經濟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除外交外台灣軍政大權、人事安排，一律由蔣掌控，軍隊可以保留，社會變革可以從緩，即原有制度可以延續，台灣財政不足悉由中央政府支援，雙方互諒互尊，不傷民族感情。這是多麼清晰完整的創新設計，故稱之為“一國兩制”理論的早期版本，稱之為“一國兩制”思想的歷史淵源和文化基因，絕對實事求是、公正合理。

(二) 有關兩大基本社會制度的辯證理解

在兩大基本社會制度對話對接、對壘對決中，澳門擁有獨特發言權，一方面有近五百年中西文化交匯歷史積累，另一方面，作為“一國兩制”有效載體，亦正處於兩大基本社會制度的接觸前沿陣地。實踐證明，作為正統社會主義國家，在其歷史背景特殊的局部地區，保持原有資本主義 50 年不變，是因為資本主義有可資利用、為社會主義國家所利用的積極性一面，這正好構成認識論領域前所未有的最大求同存異、對立統一。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基本制度正式對抗，可以認定是發端於一百多年前的蘇俄十月革命。遺憾的是蘇維埃社會主義留下的是至今令人不解的失敗教訓。

2019 年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旗的新中國成立 70 週年。建國第一個 30 年為探索社會主義實踐規律亦曾付出過不輕的代價。40 年前，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之初的 1982 年，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成功制定出面貌一新的憲法，其中第 31 條更破天荒地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從此，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主體之外，可以依法設立保留原有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別行政區，此舉亦為兩大基本社會制度對抗與互斥轉入新時代、新使命、新特徵開啟了先例。“事實證明，‘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⁷

(三) 關於“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了特別行政區憲制基礎”

這項判斷自從 2014 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提出以來經高密度宣傳推介，已受到港澳各界普遍認同。憲法是國家根本法、最高法，強調憲法權威性、高階性，強調尊崇法治，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完全必要，但“共同構成”把憲法與基本法並列，平起平坐，其

邏輯嚴謹性似存不足，如表述成“憲法為特別行政區奠定憲制基礎，基本法在憲法授權下實現了特別行政區憲制規範的系統化、具體化”，似乎更加符合憲法作為母法在特別行政區的統帥地位，以及基本法作為憲法補充法、特別法的功能定位，也令行文邏輯的層次性嚴謹性更高，而且需要強調的一點是，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的不僅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而是其完整的憲制規範體系，不僅實現了中央與特區兩級管治的科學規劃，而且史無前例地創建了嶄新的特別行政區制度。

(四) “博弈”(Game、Gaming)似有待深層理解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40年前出現在深圳的這個標語，曾經是推動改革開放濶步前行的導向標。它清楚地道出當代競爭或博弈的重要性，“博弈”一詞之所以一再被忽略，很大因素可能在於被理解為負面用詞。其實，博弈，說精確一點，就是競爭(competition)、競賽(contest)的代名詞或近似詞。

博弈是人類社會幾千年文明演變史上常見常態現象，也是文明進步的動力源泉：政治領域圍繞“權”(power)字在博弈；經濟領域圍繞“錢”(money)字在博弈；文化領域圍繞“是與非”(yes or no)、“對與錯”(right or false)在博弈；軍事對抗以至戰爭份屬博弈的極端化、異向化，理應被文明博弈所取代。未來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美兩個經濟體量最大的國家之間的博弈、兩大基本社會制度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博弈，東西方兩大文明體系之間的博弈，勢將具有全域全方位性、常態性特點。

金融中心(financial center)在政界與學界往往被認定是個正面詞，而博彩中心(gaming center)往往被看成是半正面詞或負面詞。金融中心的博弈，不管實體還是虛擬，有形還是無形，實質不外乎圍繞股票、債券、期貨、外匯而展開的廝殺，同博彩中心直截了當地面對面搏殺，性質如出一轍，大同小異，用“小巫見大巫”、“五十步笑百步”來界定，於法於情於理一點都不過分。故對前者全面肯定，對後者保守有餘、肯定不足的常態認知，似有必要盡早作出調整。

說澳門博彩業是現代經濟體系中的特種服務業也好，說博彩中心與金融中心有其共同性一面的博弈性質也好，並非盲目吹捧博彩業，但博彩業的依法經營特點及其對社會利大於弊、功大於過的現實，必須得到境內外的普遍共識。澳門沒有必要在“賭城”、“一業獨大”等無形重壓下生存、喘息，在博彩業面臨賭牌續期的重要時刻，多一點深層理解思維實為重要。

III. 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⁸為此，必須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

一、澳門變強與核心引擎的定位

回歸迄今的20年間，澳門在積累、在擴充、在探索、在完善，可以講在經濟、社會發展上，初

步實現了形態蛻變：人口由 42 萬增至 65 萬，增幅逾 50%，面積由 24 平方公里增至 32 平方公里，增幅超 1/3，GDP 由澳門幣 539 億元增至澳門幣 4,403 億元，增幅達 7 倍以上，人均 GDP 由 15,608 美元，增至 82,609 美元，增幅逾 4.3 倍。⁹ 這是自身以至國際發展史上罕見的跨越式發展，受到各大國際組織幾乎一致的認同：由中端指標到高端指標，有寂寂無名到交口稱讚。對於來之不易的發展成果，澳門人不應被盲目性簡單化思維拖入被動，在肯定大方向、大發展的同時，不應忘記現實中的短板有待修補，劣項有待強化與優化。

即將進入實行“一國兩制”的第二個 20 年或 50 年不變的後半征程，澳門特別行政區得天獨厚，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天時、大地利、大人和正全面展開。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簽發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把澳門定位成拉動粵港澳大灣區的四大中心城市、四大核心引擎之一，此舉有利於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內涵。充分認識與利用“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和港澳傳統優勢，是建設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打造高品質發展的典範的關鍵性因素。

形勢十分有利，但同樣也是挑戰與機遇共存。走好“一國兩制”新征程，力求在第二個 20 年真正建成宜居、宜行、宜遊、宜業，有更高發展指標、更高綜合素質、更高綜合競爭力，山美水秀、人傑地靈，自我感覺良好，外人觀感正面的經濟發達地區和法治發達社會，恐怕還要適度提倡臥薪嚐膽、韜光養晦、艱苦奮鬥、自強不息一類的本土文明。

二、新天時新地利新人和

以中共十九大為標誌，中國進入了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的發展新階段。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包括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即實現途徑、行動指南、根本保障、靈魂基礎四大板塊；“一國兩制”表面上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存在差異甚至矛盾，實質上異曲同工、殊途同歸，主旨目標都是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

“一國兩制”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不可分割組成部分，是現階段全中國人民的一項共同性事業。“一國兩制”不但不構成對當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傷害，反而可以為其提供補充、啟迪、借鑑，從而形成特殊性質的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現階段，特別行政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含有資本主義成分，但宏觀上仍需認定為“姓社”。當代全國人民最大政治是分階段實現“中國夢”，而成功實踐“一國兩制”就是向實現“中國夢”的終極目標靠近。

實踐沒有止境，理論創新也沒有止境。世界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變化，中國也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變化，我們必須在理論上跟上時代，不斷認識規律、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國家在《發展綱要》裏對澳門提出了更加全面且影響深遠的三個發展定位，即“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¹⁰ 澳門近五個世紀以來的國際交往中，留下了十分寶貴、十分罕見的文化遺產，甚至可以講它是五百年前早期全球一體化、國際化的一個前沿據點，也是影響近現代中國國情的嶺南文化核心基地，無論歷史上還是現代視角，小澳門但功能多作用大是一個不能忽視的潛在資源。

三個有機結合是當前提升“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必然要求，即“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

‘兩制’差異有機結合起來，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把維護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尊崇法治，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把國家所需和港澳所長有機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促進粵港澳優勢互補，實現共同發展。”¹¹

三、有待重點關注的幾大課題

(一) 關於特別行政區制度

《澳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50 年不變。”(第 5 條)這表明：(1)澳門特區實行的是與國家主體部分不一樣的制度和政策；(2)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可以保持；(3)實踐期預設 50 年不變。這就是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的三大核心要求，這就是特別行政區制度，具體地說，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故此，把特別行政區制度同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等同的認識，是不確切不全面的。

國家基本政治制度份屬憲制、憲政領域的核心課題。中國憲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制，中國憲政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中國現有四大基本政治制度，其中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基本政治制度。這些政治制度是基於中國特色獨特國情與特定發展階段，總結以民為本、依法治國豐富經驗而形成，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最核心的內涵與發展要求。

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實踐也已有兩個十年期的驗證。特別行政區制度，事實上作為一項前所未有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的成果，有利於當地保持長期繁榮穩定，更直接促進國家和平統一大業；“一國兩制”姓“中”，特別行政區制度也姓“中”，受到舉國上下認同、支持，也受到舉世公認。事實上，它業已成為暫時不叫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這個特別行政區制度或“一國兩制”政治制度是百分之百的國產國貨，是中華文明五千年演變的必然，是當代獨特中國國情的獨特要求，它滿足的不僅是現有港澳兩個特區廣大居民的福祉和利益，而且也是近 14 億全體中國人民以及海外華人世界的共同期盼和要求，甚至可能引發中國改革開放代表的當代思想大解放的深化拓展。

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政權屬性至少可以列出：(1)管治形式的垂直從屬性或中央管治權威的不可逾越性；(2)高度自治權的中央授予性；(3)兩大基本社會制度求同存異、對立統一的深度探索性；(4)理論與制度雙重創新性；(5)國家既定目標與居民實際福祉高度一致性；(6)示範效應全方位性、多元多域性。

(二) 關於“國家所需、澳門所長”

作為特別行政區被國家作出特殊法律定位加以保障，作為特區居民無時無刻不享有國家相關政策的關懷和支持。故此，想國家之所想，急國家之所急，同國家保持同步前進步伐，就是一項義不容辭的時代使命。

1. 國家對澳門的“需”

應該強調的不是泛泛的國家所需，而是有特殊針對性的“需”：一需成功實踐“一國兩制”，做

“一國兩制”排頭兵；二需澳門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既主動搭乘祖國發展快車又敢於拓展新型發展模式；三需澳門成為國際文明指標的載體，澳門近 20 年跨越式發展屢創世界高指標，但澳門總體文明程度仍有頗大提升空間。

2. 澳門所能提供之“長”

澳門優勢很多，機會不少，當下要抓住的重點是：一長五百年中外文化交流的獨特積累，澳門客觀上是東西兩大文明體系對接對壘的前哨，居功至偉；二長堅定悠久的愛國愛澳文化傳統，澳門是嶺南文化主要開拓者、傳播者之一，開風氣之先歷久彌新，其中林則徐、鄭觀應、孫中山更是可以用國際級思想家予以歷史定位；三長多元而獨特的發展環境及多域創新的孵化器。在基本法保障下澳門擁有世界一流的博彩業，政權性質上開拓、引領兩大基本社會制度的對壘對接。

(三) “一國兩制”文明觀

在國家全面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核心價值觀的新時空，在特別行政區強調“一國兩制”文明觀是理所當然、與時俱進的必要舉措。所謂“一國兩制”文明觀，至少應涵蓋以下基本認知：

(1)愛國觀：堅持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是當代任何國度的居民都不應該喪失的心理素質，愛國愛澳、愛群愛己，已成特區居民一項時尚價值符號；

(2)是非觀：尊重客觀、尊重事實，大是大非面前有主見，真假、善惡、美醜面前不失據；

(3)奮鬥觀：敢為人先、敢闖新路，肯付出、懂競爭，善開拓、巧發力，改寫平凡、成功在己；

(4)生存觀：珍惜生命，珍惜時間，積極樂觀，目光朝前，不越權不違規，生理與心理雙健康；

(5)榮辱觀：保持個人榮辱與國家榮辱一致性，與權錢導向行為絕緣，站穩做人做事起碼台階。

(四)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放包容、走自己路

踏入新時代新征程有必要形成社會共識的幾項是：總結 20 年“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基本規律：拿出澳門經驗、澳門選擇、澳門做法、澳門取向；關於社會基本矛盾，澳門仍然是財產佔有為背景二元結構兩極分化社會結構，要改變現狀離不開政府與社會兩強驅動、產業與社會結構兩個深度調整；提升國家意識、尊重中央權威，發展積極健康的中央與特區關係，既是 20 年來成功經驗之一，又是有待全澳門上下長期關注、長期維護的課題之一。

中國改革開放 40 年間，不僅國家大政方針從指導思想到具體舉措相繼發生了體現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巨大變化，而且廣大群眾從認知到心理同樣經歷了一場新事新辦、特事特辦的深刻洗禮。其實，所謂改革，就是告別一切不利國計民生、不合時宜舊規舊俗；所謂開放，就是打開國門，把外界一切好的進步的文明成果吸收過來。這就是加速發展或推進文明的過程。

繼續保持高品位、高品質發展，並強化對自身發展規律認知和行動自覺，這是堅持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或實現“兩個一百年”民族偉大復興與“中國夢”的歷史使命與時代要求，當然也是當代澳門人以實際行動“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的最大幸福感、獲得感、成功感的滿足過程。

四、結語

對於“一國兩制”這樣體現理論與制度全面創新的事物，應強調多元多角、多域多維的精準觀察、思考、探索。以下僅舉一反三，列出幾項常用切入方法：

一是知行合一觀。知行統一、知行兼程、知行共進，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理論靠實踐驗證也靠實踐補充完善，兩者不容脫節。作為特區人，珍惜、珍重來之不易的“一國兩制”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是守土有責的使命與義務。

二是求同存異觀。大同小異、同中有異、化異為同、互利共贏，“同”和“異”本身就具相對性，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同”，也沒有絕對的“異”，二者共生共存、互補互鑑是求真求實的客觀要求。

三是開放開明觀。既要打開國門，把一切人類文明成果吸收進來，為我所用；也要開誠佈公、透明寬鬆、包容和諧。做開明開朗的人，這是社會發展進步要求，也是修身齊家、健康成長的行為準則。

四是對立統一觀。是非、真偽、強弱、敵我等概念無不具有動態性、相對性、可轉化性。要掌握事物發展主動權，就要設法認識矛盾轉化規律，就要學會並善用辯證法，要力爭轉弱為強、化被動為主動、化敵為友，令劣勢此消彼長、優勢此長彼消，積極尋求願望與利益的最大公約數。這是哲學普及化、大眾化必由之路，也是事業成功的可靠保障。

“一國兩制”正確實踐與正確理解構成正相關：簡單化、表面化、公式化、乃至絕對化一類行為操守誤國誤民。在大天時大地利大人和新時代，特別行政區航船乘風破浪遠航成功具有高確定性，這既靠國家的關懷指引，全國人民的愛護、支持，同時更靠特區人自強不息、自主自重，既不忘奮勇開拓，更能保持頭腦清醒。

註釋：

- ¹ 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的報告》，載於《中共十九大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5頁。
- ² 《習近平論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2年，第141頁。
- ³ 《辭海》(第六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第2492頁。
- ⁴ 楊允中：《“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合格載體誰屬》，載於《“一國兩制”研究》，2018年第4期(總第38期)，第19頁。
- ⁵ 楊允中：《正確判斷澳門區情：一個永恆的主題》，載於《“一國兩制”研究》，2019年第1期(總第39期)。
- ⁶ 楊允中主編：《“一國兩制”百科大辭典》，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1年，第396頁。
- ⁷ 同註1，第44頁。
- ⁸ 同上註，第20頁。
- ⁹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本地生產總值2018年》，第42頁。
- ¹⁰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載於《澳門日報》，2019年2月19日，第B10版。
- ¹¹ 同上註。